

日本哲学 与思想研究

刁榴 主编

2016

本辑内容涉及日本战后、近代以及近世的哲学、思想和文化，收录了国内日本哲学、思想研究领域知名学者的论文，并设置了青年论坛和特邀日本学者论坛。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日本哲学 与思想研究

2016

刁榴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 2016 / 刁榴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 - 7 - 5201 - 1580 - 3

I. ①日… II. ①刁… III. ①哲学思想 - 日本 - 文集
IV. ①B31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0264 号

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 (2016)

主 编 / 刁 榴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荣欣

责任编辑 / 徐碧姗 李秉羲 徐成志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3.75 字 数: 374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1580 - 3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刊编委会委员

(按姓氏笔画顺序)

刁 榴	王守华	王 青	韦立新	牛建科
方浩范	邢永凤	毕小辉	刘岳兵	刘金才
刘晓峰	李海涛	李 萍	李彩华	李甦平
吴光辉	吴伟明	吴 震	陈化北	范景武
林美茂	赵晓靓	娄贵书	徐晓风	郭连友
龚 颖	韩立红	潘畅和	魏常海	

序

成立于1981年的中华日本哲学会（Chinese Society for Studying Japanese Philosophies）作为研究日本哲学、思想与文化的全国性学术团体，成立近40年来，积极开展对日本哲学与思想、文化方面的学术研究，并促进中日两国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为了宣传和展示会员的研究成果，中华日本哲学会自2015年起创办了学会会刊《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以书代刊形式）。继林美茂、郭连友主编《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2015）》之后，本书是会刊第二辑。

综观本辑稿件，令人欣喜的是我们的研究正不断地取得新的突破。本会会员的构成以日语院系师生为主，因所受学术训练和知识结构侧重点的关系，我们以往的研究主题多关注近代以前，较少涉及反映现实社会的现当代问题；研究方法以梳理和总结为主，不擅长问题分析和逻辑推理；研究内容多以思想和文化为对象，而追索关于人类、宇宙的终极性根源性“哲学”问题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但本辑邓习议和日本学者嘉指信雄的两篇论文均以日本战后的哲学与思想为主题，拓宽了我们的研究范围。邓习议的《关于广松哲学的意趣、结构与评价》在对广松哲学的“三大转换”——政治上从“脱亚入欧”到“脱欧入亚”的转换、经济伦理上从“消费主义”到“生态主义”的转换、哲学上从“实体主义”到“关系主义”的转换——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广松哲学的理论目标就是克服与超越西方哲学主客二分的实体性思维方式，将其推进到东方式主客统一的关系性思维方式。嘉指信雄《从原点重新思考：反核与和平思想——平冢雷鸟、丸山真男、森泷市郎》一文通过多角度梳理和呈现日本战后反核与和平思想领域

三位知识领袖所提出的思想的意义及遗留问题,重新思考核与世界和平。这两篇文章对于我们在21世纪从东西方哲学融合的高度思考世界与人类的未来非常富于启发意义。

对于日本近代哲学与思想的研究,我们的学术积累比较深厚,下面的论文以日本近代代表性哲学家福泽谕吉、西周、吉野作造等为考察对象,进一步深化了以往的研究。赵晓靓的《论吉野作造思想的哲学基础》和朱坤容的《尘心与道缘之间——以圣严法师的日平佛教研究为中心》分别关注东方思想文化的因素对自由民主主义者吉野作造和圣严法师的思想的影响。刘岳兵的《近代日本思想家西晋一郎的中国儒学论》和张慧的《西周的启蒙思想活动与儒学思想》则深入剖析了近代日本思想史上力图将儒学与西方近代思想相互融通的西晋一郎和“日本近代哲学之父”西周的启蒙思想如何对中国儒学思想进行批判性吸收,这种研究不仅有利于我们认清近代日本对中国儒学的摄取方式,而且对于思考儒学的现代性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如果说以上论文都致力于探讨中国思想对于近代日本的影响,郭连友的《梁启超与吉田松阴》和葛奇磻的《梁启超与进化论》则重点考察了吉田松阴的学说以及日本的进化论是如何反哺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思想家,并对晚清以来的政治改革运动产生影响的。王鑫的《日本“妖怪”研究的历史回顾》一文也是从中日思想文化交流的视角出发,对日本的妖怪研究进行了详细介绍,并期待日本的妖怪研究史能对我国今后的“妖怪学”提供可资借鉴的研究方法。

日本近世思想文化研究一直是我国日本研究学界的热点。陈化北的《朱子的理气说与安藤昌益的真气说》探讨了中国朱子学和江户时代安藤昌益的思想之间的关联,邢永凤的《日朝知识人之视线——以〈两好余话〉为中心》通过分析1764年朝鲜通信使与日本知识人的笔谈史料《两好余话》,考察那一时代中、日、朝三国的关系和秩序。韩立红《石田梅岩思想的公共性》一文论证了梅岩思想中包含公共哲学的“共媒、共动、共福”,即相互尊重、相互协助、共同幸福的特点,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对石门心学进行了诠释。

中华日本哲学会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注重“传帮带”，努力培育新生力量，以期学会薪火相传，兴旺发展。本辑也设置了“青年论坛”，专门刊发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论文，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学术研究。几位青年才俊的论题，涉及日本近世到近现代的哲学、思想和文化，虽然行文立论还稍显稚嫩，但已初具科研潜力，假以时日，必能“雏凤清于老风声”。

当然我们的研究还有尚待深化之处，追究起来主要是“日本哲学”与“日本思想”的界限模糊，我们对于“日本哲学”的研究往往停留于对“日本思想史”的梳理和总结上。对这一问题，本辑开篇林美茂的《中日关于“哲学”之理解的差异与趋同倾向——以峻别“哲学”与“思想”的不同为线索》一文非常值得深思。该文指出：“哲学”与“思想”之根本区别在于两者对于“知”的理解存在根本的差异。日本近代以来严格区别“近代哲学”与“日本思想”的学术领域，并把“知的探索”作为理解“哲学”的本质标准，但近年来日本学界也出现了在传统思想中寻觅哲学因素，从而向中国式哲学观趋近的倾向。然而如果不充分反思日本及中国等东亚传统知识论的基础和逻辑结构与西方究竟有何不同，而只是通过无界限地扩大西方意义的哲学范畴来寻求自身拥有哲学的理论依据，必然会遭到与“中国哲学”同样的对“日本哲学合法性”的质疑与困惑。

本辑特邀的四位日本学者围绕日本近代哲学展开的论述无论从研究视角还是研究方法上，都给我们以启示。藤田正胜的《三木清的〈构想力的逻辑〉》阐述了三木清哲学中理性与感性的“辩证统一”问题，上原麻由子的《西田哲学的再解释——作为行为的直观的面部表情》以面部表情为切入点，阐释了西田哲学关于行为的直观理论中“从被制作的事物向制作的事物”即从被动向主动的转变。水野友晴的《明治中叶的宗教感觉——以〈善的研究〉的执笔期为中心》和杉本耕一的《西田几多郎的“宗教哲学”与清泽满之的“宗教哲学”》都围绕西田几多郎与清泽满之等同时代人的“宗教哲学”中共同的一些问题进行比较和考察。与日本学者的学术交流启发我们今后应在“日本哲学”研究方面加强力量，更多地展示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独到见解和丰富成果。

本辑会刊的出版承蒙北京工业大学刁榴老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谨向北京工业大学和刁榴老师表示衷心感谢！

中华日本哲学会会长 王青^①

2017年2月8日

① 王青，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研究室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日本哲学、日本思想史。

目 录

中日关于“哲学”之理解的差异与趋同倾向

——以峻别“哲学”与“思想”的不同为线索	林美茂 / 1
梁启超与吉田松阴	郭连友 / 17
近代日本思想家西晋一郎的中国儒学论	刘岳兵 / 33
朱子的理气说与安藤昌益的真气说	陈化北 / 46
石田梅岩思想的公共性	韩立红 / 64
论吉野作造思想的哲学基础	赵晓靓 / 74
日朝知识人之视线	

——以《两好余话》为中心	邢永凤 / 86
简论福泽谕吉政治思想中的皇权思想	贺 雷 / 97
道心与尘缘之间	

——以圣严法师的日本佛教研究为中心	朱坤容 / 109
日本“妖怪”研究的历史回顾	王 鑫 / 122
西周的启蒙思想活动与儒学思想	张 慧 / 133
梁启超与进化论	葛奇蹊 / 146
关于广松哲学的意趣、结构与评价	邓习议 / 161

特邀日本学者论坛

三木清的《构想力的逻辑》	〔日〕藤田正胜 黄世军 译 / 177
西田哲学的再解释	
——作为行为的直观的面部表情	〔日〕上原麻有子 赵 森 译 / 190

明治中叶的宗教感觉

——以《善的研究》的执笔期为中心

.....〔日〕水野友晴 吴光辉 译 / 209

西田几多郎的“宗教哲学”与清泽满之的“宗教哲学”

.....〔日〕杉本耕一 吴光辉 译 / 225

从原点重新思考：反核与和平思想

——论平塚雷鸟、丸山真男、森泷市郎

.....〔日〕嘉指信雄 陈诗雨 译 / 239

青年论坛

西田哲学之思想渊源考略 赵 森 / 257

浅析中江兆民与卢梭对自由的理解之异同

——以《民约译解》为中心 常潇琳 / 269

朱舜水礼学思想初探 黄世军 / 281

由“习”致“实”

——以颜习斋与荻生徂徕之“习”论为例 刘 莹 / 291

论荻生徂徕的天命观 王杏芳 / 305

试论《漫画日本的历史》中大物语的描写手法 齐梦菲 / 317

宏文学院与中国近代师范教育

——以近代教育家陈宝泉为例 孟硕洋 / 334

从福泽谕吉的国权思想看其扩张思想 姚怡然 / 343

近年来我国日本哲学及日本思想史研究概况 仲玉花 / 354

后 记 / 367

中日关于“哲学”之理解的差异与趋同倾向*

——以峻别“哲学”与“思想”的不同为线索

林美茂**

一 引言

“哲学”(philosophy)这个源于西方的学科概念,自1860年代在日本被译出,1890年代进入中国,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虽然这一概念及学科在两国学术史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脉络,但是存在的根本问题基本一致,正是因为这种一致,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两国学术界开始出现趋同的倾向。那么,西方意义的“哲学”究竟是怎样的学问?其在中日发展的不同何在?趋同的表现有哪些?其根本原因是什么?这是本文将要阐述的问题。

二 西方意义的“哲学”

关于西方意义的哲学,似乎没有一种统一的认识,但我们可以从黑格尔与德里达的对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否定中^①,认识到西方人所理解的哲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学科创新视域下的公共哲学:中日比较研究”(编号12BZX091)成果。

** 林美茂,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古希腊哲学、日本哲学、公共哲学研究。

① 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7,第115~132页,陆阳《中国有哲学吗?——德里达在上海》,《文艺报》2001年12月4日。

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问。从结论来说,他们所持的关于“哲学”的标准,都是源于古希腊人所赋予的哲学本质,即与苏格拉底、柏拉图所揭示的“哲学”这门学问的性质有关。

正如大家所知,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哲学,是对此前的自然哲学家们哲学探索的理论总结。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哲学是从以泰勒斯为始祖的伊奥利亚学派探索世界的“本原”(arche)开始的,他们的关于自然世界的探索,区别于此前的神话中所采用的以“mythos”说明世界的方法,努力按自然原样看自然,在“logos”中寻求关于本原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然而,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家们以自然为中心的探索倾向,由于智者们的出现转向了人文主义关怀,确立了人的独立于自然的优越性存在。然而,建立在“尺度说”基础之上的智者们的人文主义的追求,同时也削弱了人文主义的真正意义。为了克服矫枉过正的智者们过于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相对主义价值观,苏格拉底的出现成了“哲学”这门学科得以确立的标志。可以说柏拉图的《申辩篇》是一部哲学宣言书,苏格拉底是哲学家之为哲学家的灵魂化身,是哲学这门学问的实践者与这个学科得以确立的完成者。

在《申辩篇》中,苏格拉底把“知”分为“人的智慧”与“善美之真知”,通过自己的探索实践,阐明了人的探索所能达到的只是“人的智慧”,这种认识状态只是人的“臆见”(doxa),而哲学则是探索不断克服人的各种“臆见”抵达“真知”(episteme)的学问。而他与社会上所谓的“有知之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对于自己的无知是有知的,即“无知之智”,而社会上的那些人对于自己的无知是无知的(双重无知),只是活在臆见,即想当然之中。这就是哲人与智者、一般人之间的根本区别所在。哲学家首先必须是一个自知己无知的人。正因为这样,苏格拉底采用“问答法”,通过“对话”(dialogos)的方式与别人探索人之所以为人的各种德性(arete)。这样的探索,绝不是采用“说教”的方式单方面地灌输、给予。因为“说教”要求教育者拥有其所教育内容的“知识”,而苏格拉底否认自己具备这种知识。而智者们与此不同,他们认为自己拥有德性的知识,所以,不追求关于事实真相的探索,只是驾驭辩论技巧,即所谓的“辩论术”,以达到说服、教育别人的目的。那么,如果以此为是不是哲学的标准,孔子的《论

语》，显然只是一部道德说教书，虽然是以孔子与弟子们的对话形成的，然而，书中的孔子俨然是一个饱有知识、智慧的教育者，其中的言论不是建立在逻辑论证、探索的基础之上，而是一个长者的谆谆教导。所以，黑格尔才会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①，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②老子的《道德经》也一样，比如，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章），那么，为什么道会生一，如何生一，等等，虽然在此书的他处可见相关的阐述，如“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一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等，但在这些断片性阐述中看不到任何关联性说明，更谈不上严密的逻辑论证。一切都只在古训般的结论性断言中完成，没有抵达这些结论的思辨过程。世界就是这样产生，人们只要相信并接受这种论断即可。这是另一种意义、内容的说教。在这里拒绝对话、质疑或进行逻辑自洽性的探索，一切只停留在一种“抽象的开始”之中^③。

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得到了其弟子柏拉图的进一步深化，成了柏拉图哲学的基础与一切思考的出发点。关于“意见”与“知识”的划分，柏拉图进一步给予了明确的对象性界定。在《理想国》（477b~484c）等对话篇中，柏拉图明确地指出“意见”的对象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感觉事物”，而“知识”的对象则必须是保持自身同一性、恒常不变的“本真存在”（ontos on），柏拉图使用了“形相”（eidos）或者“相”（idea）、“实体”（ousia）等概念指称这种存在。并进一步指出，即使“正确的意见”（orthodoxa）也不是“真知”。那是因为，要真正达到知道的事情、事物，知道者必须能够给予明确的逻各斯（《理想国》534b，《斐多篇》76b，《拉凯斯篇》190c），也就是说能经得起逻辑论证，达到无可辩驳的程度，而“正确的意见”只是结果偶然正确，在逻辑上却无法说清楚，正如盲人走路，偶

① 黑格尔在这里所谓的“智者”，与古希腊的智者学派的“智者”有所区别，不是同一个概念。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19~120页。

③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31页。

然到达正确的目的地一样。所以,“正确的臆见”,仍然是“臆见”,不具备“真知”的资格。而现实中,只有真正的哲人才是相信真知的存在,并不懈地努力探索、寻求抵达、把握真知的人,即所谓“爱智慧的人”(philosophous),而其他的人都只是“爱臆见的人”(philodoxous)。“臆见”的希腊文 doxa,有想法、意见、猜想等含义,在这里柏拉图显然把“哲学家”与“思想家”,“哲学”与“思想”区别开来,两者是不能等同的。正是建立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之上,德里达才会说“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当时他还补充说明自己的论断不存在思想与哲学孰高孰低的价值判断。甚至他作为传统形而上学,即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对者也是人们所熟知的。所以,显然他的断言是从我国学术的性质出发而持有的结论。也就是说,按照由苏格拉底、柏拉图确立的“哲学”这门源于古希腊的学问标准,我国的传统知识体系只符合思想知识,即 doxa 的标准,不具备哲学知识,即 episteme 的资格。

根据以上的简单梳理,我们不难看出,确认是不是“哲学”,关键在于对于“知识”的理解如何,对于“知”如何把握,决定了“哲学”与“思想”的区别。西方古典意义的哲学,就是通过对“知”与“臆见”的严格区别,让“哲学”从“思想”的范畴中独立出来,成了“思想”这座文明金字塔顶端最璀璨的明珠。“哲学”之所以存在,就在于它把人们的各种“臆见”,即思想,通过逻辑论证、探索,努力向“真知”,即真理靠近。然而,由于真知的对象是“本真存在”,它超越于人类存在之维度,所以哲人充其量只是一个“爱智者”,永远不可能达到“有智者”,即拥有真知的存在。与此相对,不从本质上区别“真知”与“臆见”,只以思想为指归的我国诸子百家以及沿袭数千年的学问,其中的学问之圣人就是“有智者”、“为天地立心”者,正如程颐所说:“圣人,生而知之者也”(《二程集》)。他们的言论、思想就是真理,只能“祖述”,不容置疑、批判。这样的学问,在西方人看来当然不是哲学,只是说教、思想而已。那么,无论黑格尔还是德里达,他们质疑“中国哲学”都是以上述古希腊意义的哲学为标准是显而易见的。而从中我们也不难理解西方意义的哲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问。

三 “哲学”在近代日本与中国

“哲学”一语源于希腊语“philosophia”的翻译，译者是日本明治初期的启蒙思想家西周。然而，一百多年来，没有人对此翻译是否存在问题进行应有的考察。其实，西周在翻译这个概念的时候，遇到了东西方相关学术对应性认识的理论困境，他并没有完全从本质上真正把握“philosophia”的内涵。正因为如此，他在翻译初期，多次出现把“philosophia”与“理学”“儒学”相混淆理解的现象。比如他说，“其所言 philosophy 之学，简述性命之理不轶于程朱之学，本于公顺自然之道”^①，“大概孔孟之道与西之哲学相比大同小异，犹如东西彼此不相因袭而彼此相符合”^②，“东土谓之儒学，西洲谓之斐卤苏比（philosophy），皆明天道而立人极，其实一也”^③，这些足以说明他所理解的西方之“philosophy”存在着对其本质把握的欠缺。虽然他没有像后来的中江兆民那样以“理学”翻译“philosophy”，而是自己创造了新词“哲学”，这里一方面应该肯定其创造性的意义，另一方面也应该知道，他的这种区别对待东西方学术而独创新词，并不是真正把握了两种学问性质的根本不同，仅仅是为了区别东西两种学问的需要。比如他说：“尽管可以采取直译的方式将之翻译成理学、理论之类，但是由此却会过多地引发与他者之间的混淆，故而如今翻译为哲学，与东洲之儒学一分为二”^④。凡此种种，都在告诉我们，西周所理解的“philosophy”存在一种误读的因素。

西周的“哲学”译语，是从最初的“希哲学”“希贤学”发展而来的。“希贤”一词，受到周敦颐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通书·志学》）的启发，他在《百学连环》中解释“philosophy”的时候做了说明^⑤。在汉语中“贤”与“哲”通，所以就有了“希哲”的造语。然而，在这里

① 『西周全集』第1卷、宗高書房、1981、8頁。

② 『西周全集』第1卷、305頁。

③ 『西周全集』第1卷、19頁。

④ 『西周全集』第1卷、31頁。

⑤ 『西周全集』第4卷、宗高書房、1981、145～146頁。

西周混淆了周敦颐所揭示的“志学”三种阶段的不同对象与境界。士者仰慕的对象是贤者，即所谓“见贤思齐”，贤者追求的目标是成圣，而只有圣人，才能通天地之理。正如荀子所说：“所谓大圣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辨乎万物之情性者也。”（《荀子·哀公》）而西周只取“士希贤”一种阶段涵盖三个阶段，以此与“philosophy”之“爱智慧”对应。希腊人所说的“爱智慧”中所爱的对象，即“sophia”，除了一般意义的人的智慧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还有“真知”之义。而这种“真知为爱”，才是“philosophy”这种学问得以确立的根本。显然，希腊语的“sophia”与“贤”或“哲”是不对等的。如果按照苏格拉底、柏拉图对“philosophy”的界定，宋学中所谓的“希贤”或者“希哲”，只是“臆见为爱”，只有“希天”之圣人，才是“真知为爱”，所以，只有“圣人”才能与西方之“哲人”境界相当。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儒学中的圣人是“有智者”，而“philosophy”之“哲人”永远只是“爱智者”，两者也是不能对应的。

之所以产生这种不对应性，原因就出在传统中国与古代希腊，东方与西方两大文明对于“知”的理解不同。前面已经说过，苏格拉底、柏拉图把人的认识状态分为“臆见”与“真知”，“臆见”乃至“正确的臆见”是人可以拥有并达到的认识状态，而“真知”永远只存在于探索、追求的前方，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真理之境，所以才有“哲学”存在。而我国的学术传统中，只有“知”与“不知”的区分，即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没有再进一步把“知”分为“真知”与“臆见”。《论语》中的这句教训，已经肯定了人是“有知”的存在，所以才有“圣人”出现。而在古希腊哲学中，“臆见”是介于“知”与“不知”之间的认识状态，正是这种“中间状态”的发现，凸显了“哲学”存在的意义，才把人的最高存在确立在“哲人”而不是“圣人”之境。

西周在翻译“philosophy”时，并没有把握西方之“philosophy”如此深层的意义，即没有触及哲学与儒学、理学最根本的关于“知”的不同态度，从而混淆了“真知”与“臆见”的区别，无法理解“philosophy”所爱的“智慧”是峻别于日常意义智慧之“真知”。这个问题也可以从他的知识论

中得到印证。西周认为“知之源自五官感知所发，是由外及内的东西”^①，这种认识显然是把“臆见”与“真知”混淆。根据柏拉图哲学，通过五官感觉所捕捉的事物，只能产生“臆见”，“真知”是通过理性在逻各斯中把握对象，只有触及本真存在，即事物的“idea”“eidos”，才能到达真知。

以上这些现象告诉我们，西周在翻译“philosophy”时存在理解不到位与误读的问题^②。不过，西周的这种误读，在近代日本学术界并没有带来什么不良的后果。一百多年来，日本学界努力进行着对西方学术的深入研究，不断纠正前人的不足，完善自身的认识。学界并没有把日本传统的思想以“哲学”命名，而是坚守着“近代哲学”与“传统思想”的严格区分。“哲学是以从根本（出发）对事物进行本质考察之知的探索为特色”的学问^③，这是学界的共识。可是，在引进这个译语的中国，情况却大相径庭。从所谓的“中国哲学史”出现以来，“思想”与“哲学”的混淆在学术界蔓延，即使到了今天，也没有得到多大的改观。

一般认为，目前可考的文献中，philosophy 一词最初进入中国应该是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 ~ 1649）著述的《西学凡》一书。他在书中所说的斐录所费亚（philosophia）最初被翻译成“理科”或者“理学”，现在采用的“哲学”翻译源于西周。而“中国哲学”的名称，可能既有受到西方人介绍中国的文献中相关表述的启发，也有当时日本学术界所谓的“支那哲学”的影响。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谢无量著述的《中国哲学史》，揭开了中国学术界接受西方“哲学”概念，梳理本国传统学术的序幕。在该书的“绪言”中说，“述自哲学变迁之大势，因其世以论其人，摄学说之要删，考思想之异同”，这里明显将“哲学”与“思想”并列理解。如果说谢无量的这部开篇之作还存在“基本未摆脱传统儒学史观的樊篱”^④，

① 『西周全集』第4卷、13~17页。

② 参照林美茂《“哲学”抑或“理学”——西周对 philosophy 的误读及其理论困境》，《哲学研究》2012年第12期，第71~78页。

③ 『岩波哲学·思想事典』岩波書店、1998、1119页。

④ 张立文：《中国哲学的“自己讲”、“讲自己”——论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和超越合法性问题》，载彭永捷主编《论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危机》，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第1~14页。